



# 图书馆读者服务 与教育研究工作

编者董原

# 目 录

绪论 .....	1
中国古代藏书的起源和发展 .....	1
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繁荣 .....	5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兴起 .....	11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	13
开创中的新中国图书馆事业 .....	17
对旧中国的图书馆接管与改造 .....	17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创建 .....	19
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成就 .....	35
读者服务工作的的发展 .....	35
读者服务工作方法的改进与开拓 .....	38
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效果 .....	57
为党政领导机关服务 .....	58
为经济建设服务 .....	62
为科学研究服务 .....	66
为文化教育服务 .....	70
图书馆学教育与专业干部培养 .....	74
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	74
学校教育 .....	80
在职教育 .....	87
中国图书馆学会 .....	91
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组建与发展 .....	91
学会工作机构 .....	93
中国图书馆学会工作的开展 .....	94
省、市、自治区及专业系统图书馆学会 .....	107
图书馆学研究 .....	109

图书馆学研究发展概况 .....	109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	115
目录学研究 .....	119
藏书建设研究 .....	123
文献分类与主题研究 .....	128
文献编目研究 .....	133
读者服务工作研究 .....	136
情报检索研究 .....	139
第九节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网络的研究 .....	141
国际交往与学术交流 .....	143
参加国际组织与出席外国图书馆协会年会 .....	145
人员交流、互访和互建图书馆 .....	148
学术交流 .....	151

## 绪论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回顾一下中国古代藏书和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程，对于今后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是有益的。

### 中国古代藏书的起源和发展

图书馆的收藏以文献的出现为前提，而文献的出现又以文字的创造为基础。中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文字是甲骨文。这种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中国文献的早期形态。清代光绪年间(十九世纪末)在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是公元前约十三世纪殷商时期的遗物。甲骨上刻的大部分是那个时期奴隶主的占卜记录。管理这些甲骨文献的是当时的巫师和史官。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萌芽。

殷商以后，周代用以记录文献的载体又有了铜器、石鼓、竹简、木简等。根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的外史、内史、御史、太史等官员都有掌管图书档案的职责。根据《左传》记载，西周时已有盟府等机构作为收藏图书档案的处所。根据《史记》记载，老子(李耳)曾为周守藏室史。这些是中国古代藏书历史见于文献的最早记录。

春秋战国时期，记录文献大多已使用竹简或木简，并且开始使用缣帛。把简穿连起来的简策已开始盛行。

简策的形制，对后世书籍有深远的影响。它被看成是中国书籍的最早形态。这一时期，由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个人著作的出现，书籍已渐多。各诸侯国都重视藏书工作，民间也有了一些私家藏书。

秦统一全国后，大规模焚毁民间书籍，使古代的文獻遭到了很大破坏，藏书也受到影响。但是秦推行的一系列法制和政策，特别是文字的统一，也给以后藏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藏书事业奠定基础的时期。《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当时官府收藏图书档案的处所有延阁、广内、秘室、兰台、东观、石渠阁、天禄阁等多处。

这时在藏书事业发展历程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是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十六年）政府指令刘向带领一些学者整理校订从民间采访搜集来的大批图书。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刘向等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共整理校订出图书 38 种，603 家，13219 卷，并为各书撰写“叙录”，记述书名、篇目、内容和校订经过等。以后又汇编成书，名为《别录》。刘向逝世后，又由其子刘歆继续根据“叙录”等，为全部图书编出目录，名为《七略》。《别录》和《七略》都已佚失。现在还可以从班固利用《七略》编撰的《汉书·艺文志》中了解其概貌。根据现有文献，人们认为：《七略》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官府藏书目录。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志目录。

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和《七略》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他们用目录这

种形式，记录和介绍了这次整理和校订的全部图书，使人们得以系统地、概括地了解西汉保存下来的古代文化典籍；其二是他们总结前人目录工作的经验，创造出的一系列分类编目的方法，使中国目录学得以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其三是由于他们整理图书，编撰目录取得显著成绩，引起后人重视这些工作，从而也推动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发展。

东汉时，政府接管了西汉的藏书，又继续搜访图书，使藏书又有成倍的增长。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蔡邕等奏请正定六经文字，把正定的经文刻于石碑，立在洛阳太学门外。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碑始立，视观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熹平石经的建立，在校订、保存和传播文献上所起的作用是极大的。以后，人们在很长一个时期，仍然利用石刻来记录文献。石刻的拓本和古籍一样，在图书馆收藏中也受到重视。

中国在汉代发明的造纸术，经过不断地改进，已逐步推广使用。至两晋、南北朝时，纸张已取代竹简、木简、缣帛，成为书写的主要材料。写本书出现后，图书增多了，藏书事业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西晋时，荀勖编撰的官府藏书目录《中经新簿》（佚）已著录图书 1885 部，20935 卷。荀勖的《中经新簿》是依据三国魏时郑默的《中经》（佚）编撰的。他在目录中使用的不同于《七略》的“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也给后世的书目分类带来影响。晋代的私家藏书，以张华、范蔚等著称。张华收藏丰富，迁居时，书车多达 30 辆。范蔚三代藏书，总计也有 7000 余卷。

南北朝时，尽管政治动荡，藏书事业仍有一定发展。南朝曾先后完成七部官府藏书目录。藏书家王俭编撰的

《七志》(佚)和阮孝绪编撰的《七录》(佚),都是以私家藏书为基础,参考官府藏书目录编成的大型书目。由于盛行佛教,这时各地寺院收藏的佛经,更形增多。南朝时梁僧 根据定林寺等藏经,参考其他目录编撰的《出三藏记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目录。

隋朝建立后,也派人到民间去访求图书。以“每书一卷,赏绢一疋,校写既定,本即归主”的方法,补充到许多图书。隋朝藏书管理工作的特点:一是为了保存和流通图书,秘阁之书各写 50 副本;二是组织藏书,把图书分为上中下三品,装以不同颜色的卷轴,以示区别,并按甲乙丙丁四部,分开储藏。隋朝私家藏书以许善心最为著名,他藏书有万余卷,编有书目《七林》(佚)。

唐代初年,出现“贞观之治”,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昌盛,也带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开元年间(公元七一三年至七四一年),官府藏书已不下于 20 万卷。这时,宫中的丽正殿、修书院(后称集贤书院)藏书已有完整的系统。一些学府和书院也开始有不同数量的藏书。唐代管理藏书的机构是秘书省。秘书省设秘书监一人。下有官员 100 余人。魏征任秘书监时编撰的《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又一部著名的史志目录。他继承荀勖等人的四部分类法,创始以“经史子集”类分图书。这一方法在中国的书目中,一直沿用到近代。

唐代编制的几部官府藏书目录,都已佚失。其中,只有元行冲等编撰的《群书四部录》、毋 编撰的《古今书录》,还可以从史书记载中,大体了解其内容。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后,由于连年兵燹,经济文化遭到破坏,藏书事业也处于低潮。但是这时起源于唐代的

中国的另一伟大的发明——雕版印刷术却有所发展。长兴三年（公元九三二年）后唐宰相冯道曾奏刻《九经》。有些人也开始自刻文集，以广流传。

## 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繁荣

宋代统一中国后，生产经济迅速恢复，雕版印刷开始发达。官府、书坊和个人刻印发行的图书，逐渐取代了写本书。藏书事业获得进一步发展。采访图书、整理图书等工作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太祖、太宗、真宗时，共有图书 3327 部，39142 卷。以后，仁宗、英宗时，共有图书 1472 部，8446 卷。再以后，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时，共有图书 1906 部，26289 卷。以后南宋又搜访遗缺图书，给予献书者很高奖赏，于是民间的藏书又逐渐集中到官府。

宋代官府藏书主要收藏在三馆，即史馆、昭文馆与集贤馆。以后又并入崇文院，再合为秘书省。北宋太平兴国至大中祥符年间（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曾先后利用官府藏书编出《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和《文苑英华》四部大书。这四部书除《太平广记》为 500 卷外，其余皆为 1000 卷。许多后来失传的古籍都有赖这四部大书，得以保存下来。此外，北宋宫内藏书处还有太清楼、龙图阁、石章阁等。南宋宫内藏书处有缉熙殿等。钤有缉熙殿印章“缉熙殿书籍印”、“缉熙殿宝”的《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书，历经宋、明内府递藏，至今一部分仍珍藏于北京图书馆等处。

始于唐代的书院藏书，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也

有很大发展。著名的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都有藏书供学者使用。此后各地所设的书院藏书也逐渐增多。

宋代私家藏书空前兴盛。北宋著名藏书家有江正、宋敏求、王钦臣等。南宋著名藏书家有叶梦得、晁公武、郑樵、陈振孙、尤袤等。

宋代藏书工作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和经验。郑樵撰写的《通志·校讎略》论述了图书著录的范围和方法、图书的分类体系、图书提要的写法、图书的访求等，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具有图书馆学、目录学性质的系统著作。程俱撰写的《麟台故事》和陈骥撰写的《中兴馆阁录》，分别记述了北宋、南宋主要官府藏书建制，反映了北宋、南宋主要官府藏书的概况，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宋代在藏书目录方面也为后世留下珍贵的遗产。王尧臣等为三馆与秘阁藏书编撰的《崇文总目》（存辑本）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官府藏书目录。晁公武编撰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编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和尤袤编撰的《遂初堂书目》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三部私家藏书目录。其中，前两部带有详实的提要，后一部记有各书的版本。这些目录至今仍是了解、研究宋以前古籍的重要工具书。

辽、金两代的藏书事业都不很发达。元代曾两次派人至杭州，把南宋官府的藏书和书板运到大都收藏，并设有秘书监、艺林库等藏书机构。但藏书的规模和数量都远不及宋代。

明代初年，国力强盛，藏书事业又随之兴起。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攻下元大都后，即将元代官府藏书运往南京，并下令向全国访求搜集古今图书，集中

收藏在南京的文渊阁、大本堂等处。

永乐三年（公元一四〇五年）开始利用这些藏书编辑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参加这一工作的有 2000 余人，分编、缮写用了三年时间，方告完成。全书共有 22937 卷，分装 11095 册，字数总计达 3.7 亿。辑入的历代重要典籍约有七、八千种。和宋代的《太平御览》等类书一样，许多失传的古籍得以在《永乐大典》中保存下来。永乐十九年（公元一四二一年）明迁都北京，南京文渊阁的藏书随之北运。《永乐大典》正本也迁到北京，贮藏于文楼。

这时，文渊阁已成为明代官府主要藏书处所。藏书最多时达 4.3 万余卷。其中有不少宋、金、元，历代遗留下来的善本。以后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整理。一次在正统年间，由杨士奇主持，编出《文渊阁书目》四卷。另一次在万历年间，由张萱等主持，编出《内阁藏书目》八卷。明代官府收藏档案、图书的另一处所是皇史宬。嘉靖、隆庆年间（十六世纪中叶）重录的《永乐大典》副本也收藏在这里。明亡，《永乐大典》正本毁。副本在清乾隆年间已散佚一部分。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大部分被焚毁，其余也劫掠散佚。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加上新征集的，第二次影印的《永乐大典》也只有 795 卷了。

明代的私家藏书蓬勃发展，至嘉靖年间已超过官府藏书，成为主流。明代初期藏书家以皇室的诸藩王为主。此外，著名的还有宋濂、郑 、叶盛等。明代中期以后，私家藏书又有发展。藏书家大都在江浙一带。以后，福建及北方也有一些。其中著名的有范钦、祁承 、毛晋、李开先、徐 等。

范钦和祁承 是浙东的大藏书家。范钦藏书约 7 万卷，主要以收藏明代史料著称。他的藏书处原名东明草堂，后取天一生水之义，改名为天一阁。天一阁是他专为收藏和保护图书而建的。清乾隆年间储藏《四库全书》的七阁，即是仿效天一阁建造的。四百年来，天一阁几经沧桑，藏书已有散失，但建筑仍保留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政府的大力修整，已恢复原貌。它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所私人藏书楼，已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祁承 藏书 9000 余种，10 万余卷，并且钻研图书整理工作、目录工作，著有《澹生堂藏书约》、《庚申整书略例》、《澹生堂藏书目》等，在藏书的理论和方法上也有很多建树。毛晋是常熟的刻书家和藏书家。他用“汲古阁”名义刻印、影抄和收藏的许多图书，都为世人重视。

清代从初期到鸦片战争前，藏书事业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官府藏书，还是私家藏书，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代。

清初没有设立专门的藏书机构。官府藏书分置于内府、翰林院、国子监等处。以后，通过建立“天禄琳琅”藏书，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工作，才形成体系。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永乐大典》之后，编出的又一部大型类书。据考订，这部类书是康熙年间，在宫内侍奉皇子读书的陈梦雷主持编纂的。他利用宫内 1.5 万卷藏书，花费了五年才完成这项工作。书成后，因为皇室争夺嗣位，陈氏流放东北，而被搁置。以后改用他人名义修订，在雍正、光绪年间，曾三次刊行，共印出 1660 余部，一部分已经流传国外，为世界一些大图书馆

所收藏。《古今图书集成》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分类细密，便于使用。因此，国外一些学者还特为之编出索引和分类目录。在《永乐大典》散失后，它已成为检索中国古典文献的必备参考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乾隆三十七年（公元一七七二年）建立四库全书馆，集 300 余人，进行编纂工作，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一七八二年）七部《四库全书》先后抄写完成。全书共收入书 3503 种 7 9330 卷。七部《四库全书》分藏于北京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杭州的文澜阁。北方四阁是宫廷专用，南方三阁允许士大夫、读书人抄录阅读。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又从其中选出一部分，辑为《四库全书荟要》，抄写两部。一部藏于宫内摘藻堂，一部藏于圆明园。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虽然收集保存下来大量古代文献，但是其原意在于“寓禁于征”。所以征集到的图书有许多遭到销毁，编入四库的书有许多也被删节窜改。这一事实已为人们所共知。

“天禄琳琅”是清廷宫内善本专藏的名称。乾隆九年（公元一七四四年），嘉庆二年（公元一七九七年）曾两次把宫内分藏各处的善本集中起来，加以整理，藏于昭文殿，名为“天禄琳琅”。并编出《天禄琳琅书目》正编十卷和后编二十卷。正编所收的书于宫中一次火灾时烧毁。后编所收的书以后也陆续散失许多。另外，还有编纂《四库全书》未收的 170 余种宋元书旧抄本，单独收藏在宫内养心殿，名为“宛委别藏”，编有《四库未收书目》一卷。

清代在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诏令各省兴建书院，书院又复兴起来。到乾隆年间，全国已有书院500余所。书院藏书也随之增加。这是继南宋和明嘉靖之后，书院藏书发展的又一高潮。

清代私家藏书人数众多。清初有钱谦益、钱曾、曹溶、季振宜、徐乾学、朱彝尊等。康熙之后，有鲍廷博、卢文弨、黄丕烈、汪文钟、郁松年等。清末则有铁琴铜剑楼之瞿镛、海源阁之杨以增、皕宋楼之陆心源、八千卷楼之丁丙，四大家。

清代的官府藏书和私家藏书都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工作，留下许多有价值的书目遗产。其中以纪昀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最为重要。《四库全书总目》中，考订这部丛书所收的图书，撰写有提要1万余篇。故又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书共200卷，字数约290万。在分类体系、编目条例、提要写法等方面，这部目录都给后世深远的影响。此外，私家藏书目录中，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黄丕烈的《蕘圃藏书题识》等，也各具特色。

清代在藏书理论建设和工作方法研究上也有显著成绩。曹溶的《流通古书约》为流通图书、传播文献提出良法。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全面论述了藏书购求、鉴别、抄录、校、编目、收藏、装订、保护等方面的方法和经验，可以视为中国早期的一部具有图书馆学性质的著作。章学诚的《校通义》是一部水平很高的目录学著作，书中阐述的理论和方法，对近代图书馆学、目录学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

##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兴起

从上古到清代，中国的公私藏书大多数是在一定范围内流通，并未向公众开放。因此，藏书工作的内容主要也限于图书的搜集、整理和收藏等。像曹溶提出的“流通古书”、“有无相易”等方法，也未能推广开来。

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一些人产生变法图强的维新思想。这种思想也影响、推动了中国藏书的性质和工作发生变化。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等人在论述书院、学校、学会等问题时，都呼吁仿效西方图书馆，创立可供公众阅览的“书藏”，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建立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康有为、梁启超创立强学会以后，就着手办报，办“书藏”，陈列图书，供众阅览。以后各地成立的许多学会，如南学会、苏学会、湘学会、粤学会等都纷纷仿效，设立“书藏”，收藏书报，供会友们阅读。有的也同时向公众开放。这些学会的“书藏”不同于传统的藏书楼，它更着重于藏书的流通和传播。这一变化，对后来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建立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李端棻上书《请推广学校折》，奏请清廷广设学校，并于京师及省会设大书楼。建立近代图书馆的趋势更形加强。中国开始筹建和建立了一批新图书馆。有的开始用“图书馆”之名，有的仍沿用“藏书楼”之名，但其性质已发生变化。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已设有大藏书楼和图书院。自光绪二十六年（公

元一九〇〇年)起,浙江、湖南、湖北、江苏、河南等省分别建立了浙江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湖北省图书馆、江南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学部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宣统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学部又制订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

这一时期私人新建的藏书楼,具有近代图书馆性质的当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绍兴徐树兰创建的古越藏书楼。徐氏建立这所藏书楼,目的在于仿效西方,为公众服务。所以特设有60个座位的图书厅。所藏七万余卷新旧图书,公众都可以在这里阅览和抄录。对管理、阅览等工作订有完备的规章,并编有书本目录《古越藏书楼书目》。

一九一二年,京师图书馆在北京正式开馆。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近代图书馆。当时鲁迅正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他为京师图书馆改组、迁移和编制经费预算等,做了许多工作。一九一二、一九一五年还为该馆调入了教育部所藏的《永乐大典》残本和热河文津阁的《四库全书》。一九二八年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一九二九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又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置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称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它的藏书和业务工作为以后国家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图书馆事业从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演变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兴起的重要时期。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图书馆,至一九一四年,已有省级公共图书馆18所。一九一五年以后,政府部门制订的《图书馆规程》、《图书馆条例》、《图

书馆工作大纲》等法规的颁布与实施，促使新兴的图书馆事业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所带来的学习空气，也给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参与的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图书馆活动汇集成一股进步力量，不仅推动了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步思想上做出贡献。

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他强调学校图书馆在教育和研究上的作用，对这所大学图书馆进行了许多改进。在他主持下，该馆补充了大量新文化图书，增设卡片目录，延长开馆时间，并倡导推行了开架阅览。

一九一八年，毛泽东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到长沙从事革命活动，对图书馆工作也相当关心。在他一九一九年寄给邓中夏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就曾提到“公共图书馆的建设问题”。在他一九二一年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中，也设有一个图书馆，负责收集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一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还建立了一些有特色的图书馆。如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成立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和一九二二年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亢慕义（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斋等。它们都是以收藏和流通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为主要任务。

##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要以二十年代末到三

十年代中期这段时期最为兴盛。这一时期，以公共图书馆和高等学校图书馆为主的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在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上都起到较为显著的作用。据一九三六年调查统计，全国已有图书馆、民众教育馆 2520 所（东北三省因日本侵占，未计入）。其中公立图书馆为 2005 所，私立图书馆为 515 所。与一九一六年统计的 293 所相比，增加七倍以上。

由于新文化、新知识书刊激增，图书馆藏书的内容、文献类型都已发生变化。新文艺和科学技术等门类图书增多。外文书刊在大型图书馆和高等学校图书馆藏书中已占有一定比例。期刊、报纸、画册、地图等类型文献已列入图书馆收藏范围。据一九三三年统计，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藏书平均为 4 万册。一九三三年统计，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为 70 万册。

在工作方法方面，通过学习借鉴国外的方法和经验，不仅在以前不熟悉的图书流通、读者服务工作上取得成效；而且在分类、编目、书目等工作上，结合传统作法，也有所改进，有所创新。图书分类已突破传统的四部法，仿效杜威十进法，编制出多种新分类法。其中使用较多的有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等。大多数图书馆报道馆藏已采用卡片目录。大型图书馆除分类目录外，还设有书名目录、著者目录等。一九三一年制定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一九三六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发行的印刷卡片目录，使图书馆目录的质量又有提高。为了更好地向读者介绍书刊资料，一些图书馆开始编制专题书目和索引。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文